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

1937—1943

③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编委会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

1944—1949

④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编委会



D23
V85/4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37 年

—— 1 月 ——

1 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发出关于红军停止向中央军及马鸿逵部进攻的指示。指示告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已承认停止剿共，联合抗日，改组国民党、国民政府，开放人民自由等条件，嘱派代表去见他们首长表示友爱，并称已奉军委命令停止对他们进行任何攻击，请他们亦勿再有攻击行动。

3 日 国民党中央军重新进逼西安。蒋介石调派中央军 25 个师进逼西安，企图以军事压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就范。同时，进行政治分化，企图内部瓦解西北“三位一体”的团结。5 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裁撤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甘肃省府委员兼主席兼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撤职留任；特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陕西省府委员兼主席邵力子辞职照准，任命孙蔚如为陕西省府委员兼主席；驻甘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辞职照准，驻甘绥靖公署撤销，派王树常为甘肃绥靖公署主任。

4 日 蒋介石扣留张学良。1936 年 12 月 30 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等军事法庭开庭审理张学良。31 日，高等军事法庭会审判

决张学良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蒋介石呈请国民政府特赦张学良。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召开委员会议通过决议：“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被蒋介石长期幽禁起来。

5日 杨虎城等发表通电反对内战。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缪澂流、刘多荃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在通电中质问中央军进逼西安是何居心，表示：“若不问土地主权之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真意为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惟以同胞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亦惟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杨虎城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与红军的周恩来、叶剑英共同协商，确定了应付蒋介石的根本对策，即三方面团结一致，做好必要的军事准备，以对付蒋介石的军事压迫，但应争取和平解决，以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初衷。应杨虎城等的要求，红军主力由庆阳、合水、宁县、正宁地区，兼程南下，于1月中旬进至西安以北的淳化、三原、耀县地区。红十五军团进至西安东南的商县地区。

7日至30日 中国共产党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基本方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的指示，申明“本党主张南京政府在张氏特赦之后，即应命令张氏回陕，率领东北军及西北全部军队开赴抗日前线，实现蒋氏、张氏共同救国的意见”。“但如南京政府不顾国家民族的整个利益，在特赦令之后，仍将张氏幽禁于南京，并将已撤退之军队重新开回，企图以武力解决东北军、西北军，则内战之祸必将继起。这种内战应由南京政府完全负责”。重申“本党将继续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基本方针而奋斗”。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声明“当此危急关头，本党、本政府站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立场，坚决地要求南京当局立刻下令停止军事行

动，肃清亲日派，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使国内和平立即实现”。9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力主和平，保持西北目前局面，非不得已不开火，乃本党目前基本方针。10日，周恩来致函张学良，表示“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作战。若进入潼关之中央军必欲逼此间军队为自卫而战，则红军义难坐视”。如蒋介石“乃依前令尽撤入陕甘之兵，立保兄回西北主持大计，则和平可坚，内战可弭，一切人事组织都好商量”。11日，周恩来致函蒋介石，指责其背信弃义，敦促其实现诺言，要蒋完成和平、统一、撤兵，释放张学良。30日，毛泽东、朱德等致电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指出：“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但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我们不能独异失去张杨”；“向张杨两部表示我们始终同他们一道，在他们不同意撤兵以前，我们不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用以上态度，争取最后的和平”。

7日 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等领导机关，由保安迁驻延安。13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到达延安。20日，抗日红军大学迁到延安，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日军政大学”或“抗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成立抗大教育委员会，毛泽东兼任主席，林彪任校长兼政委，刘伯承任副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29日，《红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在延安出版。

9日至30日 奉化谈判和潼关谈判。9日，蒋介石派人到西安，提出和谈的甲乙两案，要求西安方面择一而行。甲案规定：东北军移驻甘肃，十七路军移驻陕西泾渭河以北地区，红军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和陇海路潼关咸阳段。乙案规定：东北军移驻河南、安徽，十七路军调甘肃，中央军进驻西安和关中地区。12日，周恩来和杨虎城、王以哲会谈，决定派人到南京、奉化，同蒋介石谈判。16日，杨虎城、于学忠发表通电，接受南京政府革职留任

处分，取消西安事变以来成立的一切临时组织，要求张学良回陕，要求蒋介石回南京主持救国大计。17日，西安方面代表李志刚、鲍文樾到奉化见蒋介石。提出：（一）设陕甘绥靖公署主任，张学良为主任，杨虎城为副主任，行营主任顾祝同驻洛阳；或者设西安行营主任，张正，杨、顾副。（二）军事善后问题，潼关、华阴由中央军驻扎，东北军驻宝鸡到武威，十七路军驻关中、西安，红军驻陕北、陕南、凉州。在商谈期间，中央军停止一切军事活动。并提出由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决定国策：抗日、联俄、容共。蒋介石表示难以接受。21日，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召开负责人会议。决定派李志刚再去奉化，表示接受甲案，并要求：（一）中央军暂撤出华县，待西安方面军队移定后再行动。（二）潼宝线上，中央军不多驻兵。（三）东北军留一部在西安和咸阳到邠州的公路上。（四）十七路军留一师在西安。（五）给不允回陕的张学良以名义。（六）在五届三中全会未决定国策之前，由杨虎城接济红军。23日，李志刚到奉化见蒋介石。蒋介石坚持军事问题由顾祝同在潼关和西安方面谈判；张学良问题待西北问题完全解决后另定。26日，西安方面派李志刚、谢珂（后改为王宗山）去潼关，与顾祝同谈判。30日，双方商谈就绪，决定采取甲案，待签字后实行。

19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该电认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具有特殊意义，但是这种解决办法可能受挫，这不仅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极力挑动内战的走狗在搞阴谋，而且也是因为你们党采取了错误的步骤”。指责中共“在执行分裂国民党而不是同它合作的方针。同蒋介石和南京达成的协议被视为蒋介石和南京的投降，同西安人的合作搞成了反对南京的联盟，而不是同他们联合行动，反对共同的敌人。所有这一切，助长了亲日派的气焰”。强调“现在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切实停止内战，首先是争取使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放弃消灭红军的政策，争取同南京共同抗日，即使初期没有正式协议。因此，党应该公开宣布和坚决执行这样的

方针：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旨在停止内战、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反对日本侵略、捍卫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措施。同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军队的合作问题，应服从于完成这一主要任务的需要，并应在这方面向这些军队施加各种影响”。

—— 2 月 ——

2日 “二二”事件。1月下旬，东北军内部以王以哲、何柱国等为代表的主和派同以应德田、孙铭久等为代表的主战派的分歧日益激化。中共代表团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做了大量的工作，未能解决矛盾。1月29日，东北军团以上军官在渭南召开军事会议，在主战派的鼓动下通过决议：在张副司令未回来以前，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但王以哲等仍主张和平解决，不愿执行决议。31日，周恩来、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分别代表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应德田等人也参加。会议决定和平解决，派李志刚去潼关继续谈判，准备签字。周恩来再次阐述了中共和平解决的方针，强调要维护内部团结，多做思想工作，防止分裂活动。2月2日，应德田、孙铭久、苗剑秋等派人枪杀王以哲。东北军前线部队闻讯，连夜自动撤离渭南防线，开到高陵，一部到临潼向西安方向警戒。中央军乘虚进入渭南。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提出批评，并立即赶到王家吊唁，解除了一些人对中共的误解。随后，同杨虎城商议善后，令应德田、孙铭久等出走，派李志刚到潼关继续谈判。同时，周恩来派刘澜波到前线部队说明情况，劝以大局为重，维护东北军的团结。4日，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致电王以哲家属，对王“主持和平，力求统一团结，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遂以身殉”，表示痛惜和哀悼。6日，杨虎城和十七路军在西安的部队撤往三原。

2日 日本林锐千郎任内阁执政。林锐千郎任内阁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和文部大臣。20日，外务省提出《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其要点是：“将该地区造成巩固的防共、亲日满地带，同时有利于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以防备苏联的入侵，一切为了建立日满华三国实现合作互助的基础。”

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内蒙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指出，绥远抗战已在进行，国共合作正在成熟，须改变过去把抗日与反汉族军阀并提的策略，应以援绥抗日为内蒙工作之中心。

8日 国民党中央军进入西安。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率中央军和平进驻西安。9日，南京方面谈判代表张冲到西安。周恩来会见顾祝同。顾表示同意红军在西安设办事处，并说蒋介石原定约周恩来赴杭州谈判的计划推迟，要他先同周谈。14日，杨虎城返回西安，与顾祝同商谈十七路军改编问题。不久，十七路军改编为两个师，分别由赵寿山、李兴中任师长。杨虎城被迫离开部队，以“欧美军事考察专员”名义，于6月29日出国考察。东北军各将领在何柱国的策动下要求放弃甲案，执行乙案，离开西北。3月，东北军全部东调，几个军分别驻在豫南、皖北、苏北地区，均直接受国民政府军政部指挥。6月14日，何柱国就任西安行营副主任。

10日 中共中央发出《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要求国民党三中全会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如国民党三中全会果能确定此国策，则共产党愿作如下之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

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11日至3月15日 国共两党西安谈判。2月11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在西安举行正式谈判。后叶剑英、贺衷寒分别参加谈判。在谈判中,双方激烈争执的焦点是红军改编和苏区政权改制问题。3月8日,双方意见大体趋于一致,决定将一个月的谈判作一总结,由周恩来写成条文,送蒋介石最后决定。主要内容是:(一)中国共产党承认服从三民主义的国家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彻底取消暴动政策和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国民政府分批释放监禁中的共产党员,容许共产党在适当时期内公开。(二)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将目前红军驻屯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国民政府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由国民政府任命;行政经费由行政院及省政府规定。(三)红军取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与国军同等待遇,其各级人员由自己推选,呈报军委会任命,政训工作由军委会派人联络,将红军中最精壮者改编为3个国防师,计6个旅12个团及其他直属之工、炮、通信、辎重等部队,在3个国防师上设某路军总指挥部;将红军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或保安队;红军学校办完本期后结束;在河西走廊令马步芳、马步青部停止对红军西路军的进攻等。但是,国民党代表又推翻双方原已谈定的内容,于11日交出由贺衷寒起草的“书面修改案”。贺案提出将红军编为2万人,副职干部由国民党派遣,取消政治工作人员,服从国民党的一切命令;将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直属各省,取消民选制度;不提在河西走廊停止进攻西路军等。15日,周恩来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声明贺案完全不能承认,谈判须重新做起;西安

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顾祝同、张冲表示贺案作废，赞同周恩来同蒋介石面谈。

12日 东北旅平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等14个群众团体发表宣言。宣言指出，“目前紧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而召开三中全会，这是实现全国团结一致抗敌的绝好机会”。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要求：（一）立即实行对日抗战，收复失地。（二）实现国内和平，停止一切消耗国力的内战。（三）实行真正民主政治。（四）援助东北抗日联军。（五）救济流亡东北民众。（六）救济流亡东北失学青年和儿童。6月初，在东北旅平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群众基础上，成立东北救亡总会，刘澜波任东北救亡总会党组书记。

1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中共中央指出，西安事变有两种前途，一是国内战争，一是国内和平。今后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实行对日抗战，中共中央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是“我们对国民党一个大的原则上的让步”。“这个让步是必须的，因为没有这个让步，就不便于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便于迅速实行对日抗战。”“全党同志都应彻底了解中央的政策，团结在中央政策的周围，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全部胜利而斗争。”

15日至22日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汪精卫致开幕词，主张继续“剿共”内战，“尤勿使数年以来之剿匪工作功亏一篑”。蒋介石报告西安事变的经过，表示不赞成张学良等提出的八项主张。宋庆龄发表《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指出：中国已经被日本的侵略逼到了忍无可忍的境地，最后牺牲已经不可避免；只有忠实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才可以救中国。她斥责“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强调“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张人杰、孙科等14人提议恢复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之提案。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汪精卫提出的坚持“剿共”的政

治决议案草案，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实际上接受了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抗日的政策。会议还通过了冯玉祥等16人提出的《促进救国大计案》，决定努力收复失地，采取积极外交，集中全国人才，严惩失职，筹划开办基本工业，厉行议而必决、决而必行之精神。会议决定于1937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并决定宪法施行日期；关于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如有实行修正之处，授权常务委员会办理。会议宣称：“对内求自立，对外求共存，即使蒙受损害，超过忍耐之限度，而决然出于抗战，然亦只有自卫之心，绝无排外之意。”会后，蒋介石向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提出开放言论、集中人才、释放政治犯，但“不能不禁止宣传赤化与危害国家扰乱地方治安之言论”。

27日 组织援西军。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支援西路军，决定组织援西军。援西军由红四、三十一、二十八、三十二军及骑兵团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左权为参谋长、刘晓为政治部主任。3月5日，援西军分别从崇信、淳化等地出动。中旬，到达镇原、固原以南地区。西路军失败后，援西军按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就地待命，并派出部队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

2月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统一战线区域内党的工作的基本原则（草案）》。中共中央对在统一战线区域内，党的工作的基本原则作了具体规定，并指出：“对各党各派的基本方针应该是：联合民族革命的左派（抗日派），争取中派（妥协派），打击亲日派。”

—— 3 月 ——

1日 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对中日问题和西安事变发表谈话。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抗日的，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我们要求英、美、法、苏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

动，至少不反对，在这个基点上我们愿意同这些国家建立友谊。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民族的，这就是说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有人说共产党倡导人民阵线，这是不对的，共产党倡导的是民族阵线，这种民族阵线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范围广大得多。

3日至6月2日 佐藤外交。3月3日，佐藤尚武就任日本外相。8日，佐藤在日本贵族院发表对华外交宣言，表示中日谈判已陷于僵局，只有日本改变方法，另从新起点着手，方可解决。佐藤宣称：“要重新以平等地位进行谈判，考虑中国的要求以及与中国有密切关系之权利。”14日，以儿玉谦次为团长的日本经济考察团访华，声称要协助中国“完成现代国家之组织”。4月3日，佐藤提出《调整对华关系大纲》。16日，佐藤和大藏、陆军、海军大臣制定《对中国实施的策略》、《指导华北的方针》。强调应设法促使南京政权“逐渐抛弃容共和依靠欧美的政策，而和帝国接近，特别在华北方面，使其自动地对实现日满华提携互助的各种措施进行合作”。同时，“特别致力于文化工作和经济工作，以中国民众为对象，在实际上体现共存共荣，以有利于日华两国邦交的调整”。5月6日，佐藤向外国记者发表书面谈话，声明“日本并未抱有在华北树立特殊与独立的势力范围之意”，“应紧握每个机会，促成良好友善之空气，而使中日提携与合作，成为事实”。

4日 刘少奇发出《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刘少奇认为“我们十年来的错误，一贯是‘左’的”。系统地批评了党在白区工作中所犯的“左”倾冒险主义、宗派主义错误。着重指出六届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没有改正而且继续着立三路线的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左’倾传统”，并从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联系问题、群众斗争的策略问题、宣传鼓动工作问题和党内斗争问题四个方面，具体分析批评了这些“左”的传统。要求在党内公开批评和纠正这些“左”倾错误，实行白区工作的彻底转变。

5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电文说：“就国民党三中全会决议大致可以做出这样的答复：中共为全体中国人民渴望国内和解、以团结一切力量抗日之意志所感动，准备以三中全会提出的条件为基础开始具体的谈判，以调整两党的相互关系和两党在准备和实行联合抵抗外来侵略者方面的合作关系。”

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国内和平实现后的形势和红军任务的指示》。中共中央指出，西安谈判顺利地和平解决，中国开始走到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也走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的一个过渡时期。今天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准备对日抗战，以推动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工作与抗战的开始。党的中心任务是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成为这一运动的中心领导力量。一切工作均应转变，以适应这一总任务。红军应利用时机加强内部政治上的与军事上的训练力量，加紧党在红军中的堡垒作用。重新教育干部，使他们能够担负新形势下的新任务。严整军风军纪，学习群众工作，使红军成为抗日军队中的模范。

3月中旬 西路军的失败。1月12日，国民党军马步芳、马步青部集结2万余人，向西路军进攻。20日，攻陷高台，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3000余人大部分壮烈牺牲。临泽红军苦战后突围，到达倪家营子地区。21日，西路军决定由倪家营子地区东返。23日，东进至西洞堡和龙首堡。27日，击溃敌手枪团，歼灭敌宪兵团，缴枪1200余枝。28日，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2月1日，国民党军马步芳、马步青部开始全力猛攻倪家营子。西路军浴血奋战多日，歼敌1万余人。27日，倪家营子失守，西路军转移至三道流沟，继续受敌围攻。3月11日，西路军弹尽粮绝，向南山突围。12日，与敌激战于梨园口，继续遭受重大损失，红九军政委陈海松牺牲。西路军全部兵力已不足3000人，整个西进行动归于失败。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康龙寺以南的

石窝召开会议，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返回陕北；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将部队分组3个支队，进入祁连山开展游击战争。并向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了报告。李先念率一个支队根据中央指示，经过47天的艰苦转战，西进至甘新交界处的星星峡。其余两个支队大部分损失，一部分分散突围返回陕北，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俘，在西宁英勇就义。5月1日，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带领载运大批物资的车队，到达星星峡接应。李先念率西行支队400多人开赴迪化，抗日战争爆发后，陆续返回陕甘宁苏区。同时，中共中央通过统战关系营救出的西路军被俘人员数千人，也陆续回到陕甘宁边区。

23日至31日 延安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23日至26日，会议讨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和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中共的任务。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博古、任弼时、凯丰、彭德怀、贺龙、林伯渠、罗荣桓、廖承志、徐特立等26人。张闻天作《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形势与我党任务》的报告。毛泽东作《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的报告》。张闻天对讨论作了结论。会议一致同意两个报告，认为：（一）三中全会是国民党政策基本转变的开始。（二）三中全会使日本侵华形势发生变化，日本对华态度有所缓和，其目的是企图继续争取南京到防共阵线，是积极准备大的侵略战侵夺中国的准备时期。（三）三中全会使中国形势开始进入新的紧张准备对日直接抗战的过渡阶段，停止内战的旧阶段已经过去，而转入以争取民主权利为中心内容的新阶段。（四）在新阶段中的国共重新开始合作，中共必须在各种斗争中努力争取领导权，只要党的领导正确，是可以取得领导地位的。（五）民族矛盾超过国内阶级矛盾，中共今后应坚持民族的统一战线方针，不为局部变动而动摇。会议决定于5月召开苏区党代表会议。27日至31日，会议讨论张国焘的错误问题。出席会议的又增加了董必武、

萧劲光、胡耀邦等，共56人。首先，张国焘作检查，承认“是路线的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但对一些具体事实，却又进行辩护。然后，朱德、毛泽东、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廖承志等许多人发言，揭发批判张国焘右倾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反中央、分裂红军的错误。31日，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作总结发言，指出张国焘错误的主要内容，错误发生、发展和破产的过程，错误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错误的危害以及应吸取的教训。同时，充分肯定四方面军广大干部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指出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的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最后提出，考虑到张国焘在党内的历史及其已开始承认错误的表示，除停止其军事领导职务外，党内组织结论暂时保留，看以后实际工作转变情形再作决定。会议根据张闻天的总结，做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3月下旬 国共两党杭州谈判。周恩来到杭州同蒋介石直接谈判。周恩来提出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为基础拟成的，共产党方面承认的六项条件和要求国民党方面给予五项保证的书面意见。并口头声明：（一）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须达4万余人。（三）在3个师上必须设总部。（四）关于副职及政训人员不能派遣。（五）红校必须办完本期。（六）红军防地须增加。周恩来说明，中国共产党为国家民族利益计与蒋介石及国民党合作，但决不能忍受投降收编之诬蔑。蒋介石在谈话中承认中国共产党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由于国共分家致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局面。要中国共产党不必说与国民党合作，只是与他合作，拥护他为领袖。还说具体问题好解决，如：国民大会、国防会议中国共产党可以参加；陕甘宁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由中国共产党推荐南京方面的人来做正职，中国共产党派人任副职；红军

改编为3个师，4万余人，可以设总指挥部；决不派人破坏中国共产党的部队等。蒋介石要中国共产党提出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周恩来表示制定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一个最好办法。

3月 陕甘宁苏区改为陕甘宁特区。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林伯渠主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工作，准备更名改制，筹建陕甘宁边区政府。3月，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正式宣布改苏维埃制度为民主共和制度，陕甘宁苏区改为陕甘宁特区。4月26日，西北办事处为执行由苏维埃政府转变到特区政府的任务，决定成立选举法、政府行政系统、文化建设、经济建设4个专门委员会，起草有关方案或计划，讨论向特区政府过渡的各项工作。5月上旬，西北办事处先后通过《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17日，西北办事处召集各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会议，林伯渠作《由苏维埃到民主共和制度》的报告。会议决定从7月15日开始，进行第一届选举，采用普选办法，改选各级政府。6月20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公布《民主政府施政纲领》，提出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准备抗日战争、实行民主普选制度与议会政治、加强人民的抗日武装组织的力量、保证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等民主自由、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等16项具体主张。

—— 4 月 ——

1日至6月底 全面开展批判张国焘错误的斗争。延安会议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向全军传达贯彻《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抗日军政大学根据中央的决定，开展了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运用回忆和对比的方法，进一步分清了是非，统一了认识，更加信赖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红一、二、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任弼时作关

于张国焘错误的报告。会议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张国焘路线的揭发与斗争，认为张国焘路线的确给党、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在群众中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使中国革命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同意对张国焘的党内组织结论的保留，但要求政治局明令取消其红军总政委和军委副主席职务。庆阳红军步兵学校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一致表示拥护中央路线、反对张国焘路线，认为张国焘路线是一贯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张国焘路线的恶果给党造成的损失甚大，实际上等于犯罪。援西军总部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传达贯彻中央的决定。红四、三十一军分别召开党代表大会，对张国焘路线进行检查和批判。4月6日，张国焘写了《关于我的错误》的声明书，承认“我的错误是整个路线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最坏的表现，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24日，《党的工作》刊物发表《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对中央的决定作了具体的说明和解释。25日，援西军总部再次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任弼时进一步传达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西路军进入新疆的部队和陆续返回陕北的人员，也相继参加了这一斗争。5月，根据前敌总指挥部的决定，继续以批判张国焘的错误为党内传达和讨论的中心。尔后转入传达和讨论“反军阀残余”的斗争。6月底，这一斗争在取得重大成果后胜利结束。红军全体指战员热烈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受到了一次生动而又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增强了全党全军的团结，巩固和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3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的宣传大纲。大纲指出：（一）三中全会表示国民党政策开始转变。（二）佐藤外交并没有放弃广田的“三原则”，只想在新政策的掩盖下，拆散中国的团结，准备新的占领，以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三）在新时期，争取民主权利是巩固和平与准备抗战的关键。（四）主张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五）中日矛盾是中国革命